

世纪回望

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时期的文学演进

肖向明 杨林夕 著

SHIJI HUIWANG

Zhongguo Wenhua Xiandai Zhuanxing Shiqi De Wenxue Yanjin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世纪回望

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时期的文学演进

肖向明 杨林夕 著

SHIJI HUIWANG

Zhongguo Wenhua Xiandai Zhuanxing Shiqi De Wenxue Yanjin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回望：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时期的文学演进/肖向明，杨林夕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8

ISBN 978 - 7 - 306 - 05364 - 0

I. ①世… II. ①肖… ②杨… III. ①中国文学 - 现代文学 - 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6173 号

出 版 人：徐 劲

策划编辑：金继伟

责任编辑：陈 芳 高 洵

封面设计：林绵华

责任校对：刘 犇

责任技编：何雅涛

出版发行：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编辑部电话 (020) 84110771,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电话 (020) 84111998, 84111160, 84111160

地 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510275 传真：(020) 84036565

网 址：<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787mm × 1092mm 1/16 16.75 印张 307 千字

版次印次：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500 册 定 价：38.00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

文化与文学转型的百年身影（代序）

肖向明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大致经历了 3 次较为明显的转型。按照张法的说法，第一次文学转型，从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始，到“五四”文学止，完成了中国文学的“西化”转型。这里以中国进入世界史这一大潮为背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把小说定为文艺的最上乘作为显著标志。

20 世纪初，作为近现代之交的过渡时期人物，梁启超首倡“小说界革命”，把西方重视小说的观念引进国内，试图以西方民主自由观念的宣传来取代传统的道德说教。他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因此，“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① 王国维是引进西方文学理论的另一位先驱。他认为：“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② 他不仅把西方文化思想视作对“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的今日有益的“第二之佛教”，^③ 而且身体力行，以《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开辟了应用西方文论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

到了 20 世纪 20 ~ 30 年代，出现了中国文学的多元化局面：有与苏联式世界史相联的革命文学（从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代表的革命文学到左联领导的左翼文学，再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有与西方式世界史有关、又杂以中国古代士大夫独立心态的“学院型”文学（从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的小说到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的散文），还有与现代都市共生的通俗文学（从武侠、言情、张恨水小说到侦探、新感觉小说）。然而，中国现代性的革命主潮推动了文学的新一轮转型运动，这次转型大致可分为两条线：一是从“五四”后开始的革命文学家朝向和配合革命的新型写作，一是从延安时期开始的革命文学与民间文学的改造。

①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 页。

②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 页。

③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 页。

1985 年左右，以寻根文学的出现为标志，开始了第三次转型，其主要表现就是先锋文学在形式上对西方现代文学的模仿和在内容上对中国本土形象的创新。具体地体现为，以先锋小说为主体所达到的实绩：文学的现代叙述方式，用这种方式讲述前现代中国的故事，故事中弥漫着现代意识。^①

由政治到经济的转变，由纸质文本到传媒文化的转型，这标志着市场经济物质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宣告了文学背景的置换：启蒙革命的精英文化和严肃文化被置换为消费追求的商业文化和传媒文化。正如陈晓明所言：“他们的存在与写作处在同一平面，他们不再需要文学表达激进的社会变革，‘80 后’，占据的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文化空间，相比较起背负着历史重压和文学经典传统的那几代作家，他们面对这个时代更具有先天的优势。”^②

在当下，文学商业化、网络化、传媒化和大众化等一系列新的历史语境中，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应该在文化资源和文学信仰层面努力探索实现共享的可行性渠道，以拯救和疗救当代物欲化时代的人类信仰危机、人性沉沦和人文精神的日趋匮乏，实现对人类精神领域和心灵境界的净化，而“新生代”作家群从新世纪初的涌现到分化再到趋于沉寂，则鲜明地记录和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在立足世纪之交遭遇新颖而独特的历史语境时的一种价值归属和文化走向。^③

实际上，活跃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如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茅盾等，在对待西方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态度上，较之于梁启超、王国维等人有很大的差异。尽管他们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积累了深厚的传统文学知识，与传统有直接的文化血缘联系，但是他们生活在一个理性觉醒的时代，又都先后留学欧美、日本，鲜明的中西文化比照使他们深切地觉察到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挑战下的危机，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冲突和焦虑不安。时代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感把他们推向了“西方”，以寻求真理。鲁迅就把传统文化对自己的影响比作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极憎恶他，想除去他”。^④

然而，在强大的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的猛烈冲击之下，中国文学的主流

① 张法：《百年文学三次转型浅议》，《天津社会科学》1998 年第 1 期，第 77 页。

② 转引自刘永涛：《青春的奔突——论 80 后文学》，《理论与创作》2005 年第 5 期，第 50 页。

③ 金春平：《论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文化语境转型》，《宁夏社会科学》2009 年第 4 期，第 159 页。

④ 《鲁迅书信集·致李秉中》（1924 年 9 月 24 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 年版。

意识——儒家的载道传统一直都在努力冲破西化的帐幕，顽强地发挥自身的作用。无疑，这些都说明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自觉不自觉的试图把西方文学思潮融入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潜意识。这种“化西方”的需要，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兴起的“革命文学”运动和随后的“左翼”文学运动，乃至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中变成了实际的文学行动。^①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终于以明确的民族立场和传统的思维方式把中国文艺理论引向了本土本位。即使如此，中国文化与文学转型时期现代性的焦虑和西方化的努力一直都没有停止，只不过是在向西方认同的历史愿景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基于怨恨的以西方之‘道’鄙弃或超越西方的情结”^②。

但是，这种转型与变迁毕竟是发生在中国本土，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可能被放逐、被遮蔽，但终究不会轻易被剔除；外来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可以很快风行一时，却不可能在异域扎下根来。于是，在鲁迅那振聋发聩的《呐喊》之后，只留下苦闷彷徨的《野草》；在闻一多那支燃烧着的《红烛》熄灭之后，唯留下一沟绝望的《死水》……这种个体存在的危机感一直到“新时期文学”中仍不绝如缕，譬如，那一眼填不尽生命与热血的《老井》，那只载不尽苦难与不幸的《古船》，你想选择但《你别无选择》的烦恼，你要变奏却弄成了《无主题变奏》的尴尬，更为吊诡的是，当你想同过去告别的时候，你甚至会发现你已《无处告别》了……这些作品，虽不能否认其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都有其民族的特殊意义。这是一种文化转型时期的焦虑，这是一种价值失落时期的烦恼，同时，这或许也是一种世纪之交的追求。唯其如此，它们才不仅仅具有文学的价值，而且具有文化的意义。^③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演进正是一种矛盾的运动与状态。其间，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思维方式受到西方文学理念的冲击，被迫做出相应的改变。中国文学一方面抵制了全盘西化的企图，另一方面也阻止了纯粹传统主义的复归，在左冲右突之间进行着重建与复兴的努力。若把20世纪西方与东方的冲突与磨合所形成的文学视作主流、中心，那日益退居边缘的传统文学话语在21

① 邓时忠：《文化转型与百年文学变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科版）2000年第6期，第41页。

②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7页。

③ 陈炎：《在文化的变革中寻找文学的坐标》，《山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第77页。

世纪末又重新受到重视和推崇。在未来极其漫长的文化冲突、磨合的过程中，若能既不受全球化的规约，又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局限；不去过分加强西方化与民族化的对立，而是促使中国与西方和世界的沟通、对话和交流，那 21 世纪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将获得长足的发展，至少，莫言的成绩说明了这一点。

依此，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三次文学转型，其动力都主要来自文学外部，来自中国现代性要求和对世界愿景的宏观想象。关于文学的现代、近代、古代的溯源，以及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不同年代文学形态之间的衔接与转换，乃至称谓，这些似乎无关紧要。重要的不是简单地为某一个时期的文学形态寻找一个确定的文本证明，而应该是对某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形态的特殊性、复杂性、丰富性的细致考察和深刻透析。我们所追求的就是，在不同形态的历史转换、文化转型过程中，寻找文学变迁和演进的轨迹和理由。

其实，我有幸走上文学研究之路，首先归功于我的硕士导师王剑丛教授，他在 18 年前接受了我这样一个懵懵懂懂的学生。想当年，在中山大学那棵大榕树后面的中文系老旧的小楼里，王师与我们几个研究生侃侃而谈、不知疲倦，虽有蚊子与小虫的打扰，也丝毫不减其兴致与坚持。有时，课堂改在王师的家里，略显局促的客厅在课后又常常成为我们享受师母所烹饪的美食餐厅。至今想来，仍然回味无穷。尤使我难忘的是，王师对我们作业的批改，可谓一字一句、毫不含糊。王师的和蔼与认真，深刻影响着的人生选择和学术取向。

今年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吴定宇先生古稀之华诞，同门弟子早已纷纷向他表达敬意和感恩。当然，对于在他手中调教六年之久的我而言，更应率真、率先献上贺寿致词。但有时又真有心中万千感慨、下笔无从着手的困窘，或许这也是一种偷懒的托词吧。我也用拙笔记下那些并不如烟的往事，以献礼于先生寿筵。

记得我在博士论文出版的“后记”里，描述了道德与文章并重的吴师，使我博士三年“学习严肃、充实而又感到如沐春风”。说实话，吴师给我最大的印象是，在我们读书时吴师很严格，而当临近毕业或毕业后，他又是那样牵挂我们的成长。的确是这样，吴师“金刚怒目”的表面蕴藏更多的是“菩萨低眉”的柔情。吴师那里也总是成为吴门弟子在各地消息的发布平台，正是吴师这位旗手在引领学生们温暖前行。有师如此，真好！

2007 年 4 月，我来到复旦大学，在导师郑元者先生的指导下做博士后研究。复旦大学有着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郑师睿智、严谨而不失亲和的学者风范、学科前瞻与理论建构的强烈意识以及对学生们高度的学术期

许，使我体验深刻并将终身受益。可以预期，复旦的求学经历，既是我一个学术积累的充实期，也将是我学术研究又一个新的起点。

我想，也许正因为老师如此重要，弟子们才一向将老师看得格外神圣，可与父亲相提并论，曰“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所以，吴师绝对可以被尊称为“师父”。老师传道、授业、解惑，如同父亲对待子女，只有付出，不求回报。老师与学子数年朝夕相处，皆为“指导”，其道德楷模、学术指引、人生教导、一言一行对我等影响极大，甚至可以惠及我们的一生。古人称“人有三尊，君、父、师”。在我的人生经历中，除了亲情、友情之外，还拥有一份特殊的浓浓的“师情”，拥有了它，就能让我始终梦想在前方。

本书主要是我和杨林夕近20年来对20世纪文化与文学转型阶段性思考的结晶。所选文章曾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报》、《中山大学学报》、《学术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其中，《新华文摘》摘要、《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曾被转载多篇次，在此表达深深谢意。除此，对“成长于斯”的惠州及惠州学院，也必须表达对她的感念。

目 录

第一编 理论考察：现代文化与文学思潮检视

“启蒙”语境里的“审美”艰难

——论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价值取向 / 003

言论报国 文统未绝

——读《近现代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研究》及其思考 / 021

自由主义与“五四”文学的流变 / 026

日暮乡关何处是

——论家族文化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影响 / 036

在历史的叙述中静观现实主义

——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及其他 / 045

文学概论课程的教材重写与教学创新 / 049

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性追求 / 056

民俗·启蒙·审美

——论民间信仰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取向 / 067

“含魅”的现代虚构与想象

——鬼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呈现 / 080

穿越沉重的肉身

——略论现代“鬼戏”之源流 / 088

第二编 经典诱惑：作家与作品读解

论郁达夫文艺观对传统诗学的认同及转化 / 101

正本清源：郭沫若之文化“结算”

——吴定宇《抉择与扬弃——郭沫若与中外文化》之价值 / 108

“自悟”、“自道”、“自证”的心灵诗学

——伍世昭《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之阐发 / 113

论徐志摩散文的艺术品格 / 118**突围与突围之后**

——论觉新、汪文宣的文化“血缘”关系 / 126

启蒙时代的民俗审美

——重读《呼兰河传》 / 136

在个性追求中走向规范

——试论吴组缃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就与局限 / 145

书生回眸：“鬼文学”的现代新编

——以曹禺、徐訏为例 / 150

情归革命

——重读《白毛女》兼论“革命时代的爱情”书写 / 161

艳异风景中的奇情

——论张爱玲小说的民间信仰书写 / 174

时尚与真知的两难

——路翎《洼地上的“战役”》再解读 / 185

改革者永不言败

——读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有感 / 192

舞席歌场，时有击碎唾壶之意

——论姜夔词所蕴含的爱国情感 / 195

第三编 别样观景：香港学者散文透析**中华文化背景下的香港作家 / 205****富于解读“意味”和欣赏“魅力”的一个文学亮点**

——论当代香港学者散文 / 211

文学自由与市场规范的双向选择

——论香港学者散文的创作机制 / 214

日常生活的诗意追求

——香港中大学者散文的情感分析 / 221

人文家国的深度关怀

——香港沙田派学者散文的情感解读 / 226

真知与风尚的双重追求

——香港学者散文艺术阐释 / 236

不同的艺术呈现 一致的文化追寻

——余光中、董桥散文比较 / 243

探寻文脉与把握个性的结晶

——王剑丛《香港文学史》之意义 / 251

第一编 理论考察：

现代文化与文学思潮检视

“启蒙”语境里的“审美”艰难

——论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价值取向

通常把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中国近代文学。中国近代文学处于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变革过程之中，具有十分复杂的特性。引人注目的是，在“启蒙”旗帜下，近代文学一方面要求文学语言适合于普通国民的认读，使其“白话化”，由此倡导“三界”革命；另一方面，承担“启蒙”任务的“政治文学”急速“俗化”，为“茶余酒后之消遣”的鸳鸯蝴蝶派文学所替代，天下救亡意识演变为市场意识，导向革命的初衷后来也导向了现代性的生活消费。这期间，近代文学的变革理想与现实情状的矛盾值得我们追问和深思。以“启蒙”的名义带来的正反文学经验还直接影响到现代文学的写作和评价。本文试图从近代“启蒙”的思想来源、文化困境、文学吊诡、审美迷思以及“民族—国家”书写等层面，以“旗手”式人物梁启超为切入点，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变革与“启蒙”之关系进行再解读，做出一些探讨和反思。

一、未尽的蜕变：“近代文学”的文化语境

自严复自觉地以进化论来吹响近代民族主义的号角之后，天演进化之理、“变”的哲学观点，不仅在政治思想上使近代民族主义冲破了传统民族主义的封闭性，淘洗了传统民族主义的守旧性以及摈弃了传统民族主义的封建性，而且在文学思想上，对中国士大夫阶层传统的思维模式产生了有力冲击。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内容的“启蒙”思想的来源就是西方进化论，它导致了近代文学“觉醒”、“蜕变”、“开放”的总体特征的形成。梁启超是较早接受和传播西方进化论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他把西方进化论精神灌注和贯彻到中国文学发展之中。

梁启超文学首先强调的是转变文学观念。而这一转变，又源于他对西方进化论的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他曾把西方进化论思想具体运用到研究清代学术中，阐述了他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观点，指出“人类德慧智术之所以进化”，都是“每经一度之反动再兴，则其派之内容，必革新焉而有以异乎其

前……此在欧洲三千年学术史中，其大势最著明，我国亦不能违此公例”^①。他认为，只有不断求变，人类文明才得以维持发展的趋势。

在梁启超等人之前，虽已有一批有识之士察觉到文学的这种颓弱现状，力图变革，试图把文学引到面向现实和发展个性的正常轨道上，但在文学观念上却未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梁启超从历史进化的理论中深刻地感受到，传统的旧文学在民族危难之际，已暴露出其陈旧颓弱的弊端，已无法适应这种社会环境。于是，梁启超大胆打破守旧和封闭的旧文学观念，建立起进步和开放的新文学观念：文学应以“新民”为目的，要服务于现实。

作为以维新救国为价值取向的代表者，梁启超把文学归到其政治的功利目的中，把文学作为维新事业的一部分，并以此来界定文学的社会属性，规定、肯定文学的社会地位、重要价值和作用。梁启超在1897年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曾称有“传世之文”和“觉世之文”的区别，但更倾向于对“觉世之文”的认同，他曾说：“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也？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然时势逝而不留者也，转瞬之间，悉为刍狗。”^② 追求文学的即时致用价值是梁启超所认同的文学终极价值，他认为文学是为社会的实用和功利而取得它的社会地位 and 价值的。这显然抛弃了古人“不朽”的价值取向中追求传世的因素，而吸收了古人认为文章是“经国大业”，参与时政的实用和功利因素。这一观念与中国近代自龚自珍以来的先进文学观一脉相承。

梁启超在他的文学创作实践中注重对资产阶级意识的宣传，大声呼唤社会改革；主张灌输欧洲之精神，唤醒国民尚武、自强意识；高扬小说的巨大作用和社会意义，都是以“新民”任务为燃眉之急，把龚自珍以来“致用”的文学价值功能观体现在更为具体的觉世之中，“新民”既是梁启超重要的政治理想，也是形成他这一时期文学观念的出发点。这使梁启超的文学观念成为近代文学史上一个富有代表性的观念，也使近代文学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文学纳入救亡的时代潮流之中。

随着西学被大量传入中国，近代新的社会思潮不断涌现。吸纳外来的文学不仅适应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变易规律，“能吸受以自广”，而且符合西方进化观的要求。传统文论中的“气”、“道”、“趣”、“理”、“风骨”、“意境”、“神思”、“格律”等关键词被置换为“写实”、“表现”、“再现”、“形象”、“典型”、“主义”、“革命”等。在这方面，梁启超不仅积极倡导，还身体力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三），《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55页。

②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自序》，《饮冰室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3页。

行。他善于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在研究诗歌时，他曾这样写道，“如莎士比亚、弥儿敦、田尼逊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中国……长篇之诗，最传颂者，唯杜之《北征》，韩之《南山》”，然而相比之下，在“精深盘郁雄伟博丽”方面，还逊人一筹。^① 他不单欲借用欧西的艺术技巧和自由文体，更希望借重欧西的文艺精神补救中国传统文学的灵魂。

文学观念的更新必然导致梁启超所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文学内容的变革。

梁启超改革诗歌的步骤，首先是在总结早期新诗创作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让人们认识变革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这期间他所写成的《饮冰室诗话》便用进化发展的历史观认识评价了中国诗歌的历史和现状，对戊戌变法时期的“诗界革命”做了理论的总结，目的是要引导。因此，他热情地肯定现在，放眼展望未来，坚信今胜于古、后胜于前的发展规律。

其次是引导人们叛逆传统，改革旧诗体，取法外国，创造新文学。梁启超从政治维新的需要出发，着力改变文坛现状，选择复古主义统治最严重的诗歌领域作为突破口发起冲击。因此，他极为强调诗歌新意境的开发，提出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理论，提倡诗歌不应局限于旧内容，要勇于开拓新意境，创造新内容。

“小说界革命”中，梁启超首先提出用“导之”的办法。在梁启超的眼中，中国小说竟是“不出海盗海淫两端”，简直一无是处。可是，他又不能否认中国小说受到广大读者喜爱这一事实，“缀学之子，黄塾之暇，其手《红楼》而口《水浒》，终不可禁”。根据这一情况，他提出了“且从而禁之，孰若从而导之”的主张。同时，主张以“新编”小说代替“海盗海淫”的小说，“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夷情；乃至官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建议把“新编”说部作为幼学教科书，列入课表，让教师每日为学生解说。^②

再次是为小说正名与定位。中国文坛过去普遍存在鄙视小说的观念，小说被视为“稗官野史”、“末技小道”，不能像诗、词、文一样登大雅之堂。

①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28页。

②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第五·说部书》，《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33页。

梁启超将小说从脱离现实的死胡同中解放出来，使小说充分发挥它针砭时弊的职能，像诗文一样成为宣传政治维新的工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小说界革命”。他在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为小说正名定位，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梁启超以他的发展进化观，从明清以来中国小说巨著的出现，发现了小说的发展潜力和蓬勃生机。他认为无论“导人游于他境界”，还是“摹写其情状”，“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如小说”。虽然梁启超对小说形式问题认识较模糊，对小说的作用亦有夸大、极端化的倾向，但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这一文学变革使中国近代文坛开始重视小说，并出现了大批小说作品，迎来了近代小说创作的繁荣期。

“三界”革命，内容上倾向现实化和政治化，形式上朝着通俗化和大众化转型，用梁启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根据进化论，梁启超树立起了文学进化思想，并指出俗文学能更好地表现作家的思想感情，以便使文学在民众中产生较好的效应，梁启超提出了应当创立一种“适合于今，通行于俗”的“言文合一”的新文体。

所有这些变化都说明了梁启超不只限于一般意义上追求文学语言风格的个性，而是自觉地从语体上反拨贵族化的文学观念，促使文学走向平民化。近代文学变革不仅是一个语言、文学的事件，更是事关思维方式的转变、新型国民的培养以及对传统的反思。

作为连接古代与现代桥梁的中国近代正是一个典型的社会转型期，中外古今的各种思想观念在它的舞台上都曾上演过，特别是“西学东渐”使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个新的参照。西方列强的入侵又将“救亡”问题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内忧外患带来了中国近代社会“救亡”与“启蒙”这两大主题。梁启超等人借鉴西方观念，特别是在受到日本明治小说的影响之下，提倡“新小说”。他们有了新的读者观念，注重小说参与改良社会，提倡文学救国，与正统的“文以载道”论是不同的。

然而，这些“新”派理论家往往有“回归”传统的情结，即某些旧文学观念在近代后期被重新确认，而从西方引进的新观念有的并没有扎下根基，在近代后期就销声匿迹了。众所周知，近代文学新观念的代表人物基本是在甲午战争之后走向对中国传统美学及文学观念变革道路的。但是，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大多数的“新潮”理论家对传统的东西又表现出特别欣赏的态度，他们所致力中西融合的尝试虽然产生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最终还是走向失败。梁启超的思想道路及文学道路是具有代表性的，他对自己的认识非常清醒，他曾清晰地分析过自己的思想变化：“在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